

無神論鼻祖達爾文 之歷史地位（一）

吳家望

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極其重要，並且合乎我的目的，因為它為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提供了自然科學之基礎。 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61)

一個大企業的成长無非是適者生存。 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1900)

整個大自然是權勢和軟弱之間的不斷鬥爭，是強者不斷地征服弱者。 希特勒(Adolf Hitler, 1923)

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是十九世紀以來對人類歷史影響最深的科學家和思想家，也是世界無神論風潮的動力。經過150年的「進化」，達爾文的學說在科學上已經面目全非，但在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教育舞臺上卻根深蒂固。用今天超越科學範疇的「達爾文主義」來衡量達爾文本人，他都算不得是達爾文主義者了。前文我們談到達爾文對現代科學的貢獻，以及他本人對所謂「達爾文主義」的疑惑。以下，我們分幾次從政治經濟和哲學信仰的角度探討達爾文對人類歷史的深遠影響。

今年是達爾文誕生200周年。我們在紀念他的時候，應該將達爾文其人和達爾文主義其思想方法分開。達爾文從未隱瞞他對進化論的疑惑，到晚年也擔心他的學說被誤用的危險。不出達爾文所料，以進化論為中心的達爾文主義好像是醫治

百病的仙丹，從達爾文晚年開始，社會學家和政治野心家運用達爾文主義如魚得水，在世界舞臺上興風作浪，改變了人類歷史演變的方向。1859年，達爾文的名著《物種起源》出版之後，英國植物學家華森（Hewett Watson）寫信給達爾文，頗有遠見地稱讚說：「如果不是空前絕後的話，你也是本世紀自然歷史之最偉大的革命家」（H. Watson, 1859）。華森沒想到的是，達爾文主義的革命對象遠遠超越自然科學界。

從馬爾薩斯到達爾文

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的一個重要環節是第三章：「求生存之鬥爭」（Struggle for Existence）。他說，1838年，當他開始有系統地歸納他的學說時，讀到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On*

Population))，他突然明白了，求生存之鬥爭在動植物世界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有益之變異 (favorable variations) 得以保留，無益的則被毀滅。結果，新的物種就產生了。他說：「終於，我得到了一個可行的理論。」 (Francis Darwin, 42-43)。從此，達爾文稱馬爾薩斯為「偉大的哲學家」，成為馬爾薩斯的愛慕者 (Darwin, 1860)。馬爾薩斯認為，世界人口在25年內能加一倍。馬氏的統計資料喚醒了達爾文：原來人類社會的競爭局面同樣適合於動植物世界。(Desmond, 264-265)

馬爾薩斯是近代歷史上的一位風雲人物。他所研究的不是動植物，而是人類社會。他認為，世界人口增長之速度沿幾何級數 (1, 2, 4, 8)，而食物供應之增長速度則沿算術級數 (1, 2, 3, 4)；前者之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後者，導致饑荒、窮困和悲哀。百姓必須為生存而互相鬥爭，成者存活，敗者滅亡 (Malthus, 21-23)。從馬爾薩斯的理論「舉一反三」，達爾文認識到「群體」 (population, 人口) 之間「競爭」的重要意義，進而從種族之內 (within a species) 推廣到種族之間 (between species)。達爾文指出，他的理論乃是馬爾薩斯的 (經濟) 學說全面地運用在整個動植物世界，在那裡既沒有人為的食物增產，也沒有有計劃的繁殖限制，在那裡即使有的物種會快速增長，世界卻不可能允許所有物種都增長。(Darwin, 1872, 91)

從達爾文到馬克思

1859年，當達爾文發表《種族起源》一書同時，馬克思發表了他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荷蘭著名天文學家潘尼柯克 (Antonie Pannekoek) 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在他1909年所寫的《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一書中，潘氏概要地指出，馬克思主義以及達爾文主義的重要科學意義是，二者都是建立在進化論的基礎上，後者應用於有機生物世界之領域，前者應用於社會領域。(Pannekoek, 33)。1861年，馬克思在給德國律師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的信上說：

「達爾文的著作 (《物種起源》) 極其重要，並合乎我的目的，因為它為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提供了自然科學之基礎。」雖然，馬克思所感興趣的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科學家達爾文之生物為了生存而鬥爭的學說鞏固了他的立場。最為關鍵的是，純自然的達爾文主義為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前提鋪平了道路。馬克思的名著《資本論》問世之後，他在贈送達爾文的那一本上署名說「你的衷心愛慕者馬克思」 (Desmond, 601-602)。但是，達爾文的強者得勝的說法，卻和馬克思的被壓迫者推翻當權者的革命思想針鋒相對。而達爾文對馬克思的激進看法也顧慮重重。用西方俗語來形容，他們二位是strange bedfellows，同床異夢。

達爾文「愛慕」馬爾薩斯，馬克思「愛慕」達爾文，馬克思卻不「愛慕」馬爾薩斯。馬克思對馬爾薩斯《人口論》不屑一顧，認為馬爾薩斯東抄西襲，「沒有一句話是他自己想出來的」。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更是毫不掩飾地抨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說它是「卑劣的、無恥的教條，在可惡地褻瀆人和自然，是經濟學家之不道德的登峰造極」。為甚麼恩格斯欣賞達爾文卻憎惡馬爾薩斯？恩格斯指出，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和馬克思主義的消除私有財產、(社會) 競爭和利益衝突的目標是針鋒相對的。(Malthus, 148-149, 159-160)

馬爾薩斯的學說似乎成了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的分水嶺。潘尼柯克說：「社會主義是一種假設人類天生平等的學說，期望實現社會、權利、義務、財產和享樂的平等。恰恰相反，達爾文主義乃是『不平等』 (現象) 的科學證據 (the scientific proof of inequality)」。他進一步說，社會主義要廢除競爭和生存鬥爭，而達爾文主義不但認為鬥爭是有機世界不可避免的、有效、有益的自然規律，並且相信鬥爭會帶來更高度的完美，更徹底地毀滅不適應者 (the unfit)。(Pannekoek, 7)

從達爾文到黑克爾

當達爾文的學說在英國受到批判時，他感嘆地對德國生理學家普賴爾 (W. Preyer) 說：「從

德國來的支持是我盼望我的觀點終於有一天會勝利的主要原因。」(Francis Darwin, 280)。和達爾文交往多年的德國生物學家黑克爾(Ernst Haeckel)不但是達爾文最重要的支持者，而且畢生推廣達爾文主義。美國歷史學家加斯曼(Daniel Gasman)是研究黑克爾的權威，他認為黑克爾將達爾文主義推進為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成了德國種族歧視、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主要思想家，他的觀點終於成為德國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的溫床。從而，達爾文主義成了納粹運動興起的最重要成因(formative cause)；高等和低等人種之間的種族矛盾和鬥爭成了德國民族社會意識的基礎。(Gasman, xli, xlii)

1906年，黑克爾發起了以達爾文進化論為指導思想的「一元論者聯盟」(Monist League)，以「神聖的進化規律」(holy law of evolution)代替上帝，認為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之間的平衡是一元論道德的基礎。一元論者聯盟的領袖們批判以憐憫為中心的基督教道德觀，因為高等生命形式之進化乃是建立在抑壓和毀滅低等生命形式的基礎上(Weicker, 63-67)。黑克爾主張摧毀德國正統教會，因為他的種族優越概念不能容忍聖經「溫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太五5)的教導。(Milner, 119)

黑克爾和他的追隨者積極鼓吹達爾文主義中的馬爾薩斯因素，認為在生存鬥爭過程中，絕大多數的人必然會滅亡，惟有少數適應度高的(more fit)得以生存和繁殖，多數適應度低的(less fit)難免死亡(Weicker, 80)。

黑克爾100多年來始終是達爾文主義的英雄，美國生物教科書上必定有他胚胎學的教材。直到1998年，科學家從100年前的文獻中偶然發現，他的著名的動物胚胎進化演變的圖片原來是剪拼偽造的。這醜事居然被掩蓋了這麼多年，當代的達爾文主義者為他辯護了幾輪後，就忍痛與他劃清界限了。(吳家望, 2002)

從達爾文到高爾頓

1859年，達爾文發表《種族起源》一書

以後，達爾文的表弟，著名統計學家高爾頓(Francis Galton)運用了達爾文理論，希望將英國犬馬品種改良的優良成績推廣到「人種改良」。1865年，他發表了有歷史意義的「優生學」(eugenics，或稱「人種改良學」)文章，從此展開了席捲歐美、近一百年的人種歧視運動。高爾頓創造了eugenics這字：「優良」(eu)加「出生」(gene)，便是「優生」。他指出，人工(domestic)改進人類的品種(breed)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是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大事(Chesterton, 125)。高爾頓的基本論點是，天賦和才華都是可遺傳的，但是，低智慧者的繁殖力卻高於高智力者。這樣，久而久之，人類的智力就退化了。

高爾頓為優生學立下一個十分高超的定義：優生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切新一代種族質量的改良，並促進其達到最高優勢的因素和影響。高爾頓說，我們必須將優生學像一種新的宗教一樣，引入國家之良心。自然界的作為是盲目、遲緩和無情的，人卻能夠有計劃地、迅速地和仁慈地推行。改進我們的人種似乎是我們能做到的最重要事項。(Chesterton, 14, 130)

高爾頓於1908年創立大英優生學學會(British Eugenics Society)，並擔任會長，他死後由達爾文之子倫納德(Leonard Darwin)接任(1911-1928)。達爾文十分讚賞高爾頓的說法，他在《人類由來》(The Descent of Man)一書中，引用高爾頓的理論來表達他的看法，認為人和動物一樣，來自「靠鬥爭得生存」的過程，必須面對更嚴峻的鬥爭。一旦在生存鬥爭中怠惰，有才幹的就不能勝過缺才幹的了。達爾文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公開的競爭，法律和習俗都不該阻止最有能力的人得到最高成就，並且生養大量的後代。(Appleman, 275)(待續)

參考資料

Philip Appleman(1970), Editor, *Darwin,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W. W. Norton.

G. K. Chesterton (2000), *Eugenics and Other Evils*, Edited by Michael Perry, Inkling Book.

Charles Darwin (1860), "Letter to J. D. Hooker," 5 June, 1860, *Darwin Project Letter No.2821*, <http://www.darwinproject.ac.uk>.

_____ (1872), *The Origin of Species*, Sixth Edition, Random House, 1993.

Francis Darwin (1892), Editor,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and Selected Letters*, Dover, 1958.

Adrian Desmond & James Moore (1991), *Darwin, The Life of a Tormented Evolutionist*, Time Warner.

Daniel Gasman (1971), *The Scientific Origins of National Socialism*,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Thomas Malthus (179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W. W. Norton, 1976, Edited by Philip Appleman.

Richard Milner (1990), *The Encyclopedia of Evolution*, Facts on File.

Anton Pannekoek (1912), *Marxism and Darwinism*, Translated by Nathan Weiser, Charles Kerr & Co.

Hewett Watson (1858), "Letter to Charles Darwin," 21 November, 1858, *Darwin Project Letter No.2540*, <http://www.darwinproject.ac.uk>.

Richard Weikart (2004), *From Darwin to Hitler - Evolutionary Ethics, Eugenics, and Racism in Germany*, Mcmillan.

吳家望〈「騙局」後一章〉刊《海外校園》雜誌，2002年10月。

(作者為自由傳道人，曾獲得數學、神學等學位)